

化处境的判断密切关联的,他试图以和合多元的开放心态来作中国文化的再思考。于是,他也努力以此观念来重新解读和组织对中国哲学,包括中国佛学思想在内的一些重要观念,从而有意识地掘发其中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思想元素。从他此时期所著有关易庸之学、道家隐者与思想异端以及道家风骨等论来看,都鲜明地贯彻了新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主题。先生的哲学史著作是史亦是论,是传统的亦是当代的。他同样赋予他的佛学史论以这样一种启蒙主义的思想性质,如果不明于此,我们就无法深刻领会先生哲学史论述背后的微言大义。

我与先生第一次深入谈论学问与人生问题是在1990年的夏天,记得先生当时的处境与身体都很不好,却仍然非常认真地要求我这个刚入师们的后学谨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二十字箴言。特别让我当时印象深刻的是,先生要求我不断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视域,告诫我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先生对弟子们的期许成为我调整自己治学方式的动力之一,虽然我们现在的哪怕对治一个很小的问题都需要面对浩瀚的专业材料,很难竭泽而渔地穷尽一切。而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先生的教诲逐渐让我在治学中养成一种态度与习惯,即尽量在研究过程中去消化古今中外的相关成果,而不要闭门造车、鼠目寸光。

个人与佛学研究的结缘,是在我博士二年级时,先生要求我协助其完成点校注释《大乘起信论》。此前,我在硕士期间已经学习过吕澂先生关于中、印佛学史的讲义,对佛学初有接触与了解。先生对疏解经典的要求很高,希望我对所疏经典中的每个字义都不能够轻易放过,对原典中的每项重要概念都要皆知源流。在先生的督促下,我不仅对流传的《起信论》版本作了一些调查,对古来各家《起信论》疏也要有较为系统的解读,后来居然以此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现在看来,20多年前的那部博士论文限于当时的条件而在材料、方法上都颇显粗陋,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对中国佛学思想史的研究,还离不开当初跟随先生作经典疏解的那段训练。可以说,先生在佛学上的许多具体观点现在对我的治学影响不大,而其治学的开放态度与方式却让我终身受益。

诵业易成,风骨难得,先生不仅以其博大的胸怀来平章学术,也以此来教我们做人。先生对我学术事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方面在于,如何养成一种思想与学术上独立而又包容的心态。我自己的佛学研究很久以来都与国内主流颇有不同,这使我经常面对国内佛学界不同的声音与批判,我一直能够坚持独立走自己的路,精神上与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毕业后每次有路过武汉的机会都会去看看先生,每次谈话中,他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学问。让我感到非常温暖与感动的是,他身体不好,有时读书都成问题,却还一直关注甚至阅读弟子的研究成果。对我这样有些异类的学术方式,先生不仅没有责备,还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与鼓励。他经常用禅门中说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来鞭策我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不要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我在先生身上看到了真正老一代学人的风范与修养。他自己在学术与文化的理想上追求殊途百虑,异以贞同,也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以这样达观的生命原则来面对和欣赏弟子们各自不同的学术成长与发展。

先生不仅引领我走进佛学,更重要的是,他为学与为人的境界风范留给我永恒的精神遗产。

九转丹成道者言

——缅怀恩师萧蓬父先生

李大华

转眼间,萧先生仙逝四年多了。在那之前,我回武汉参加华中师范大学的会议时去看望他,知道他有时还下点围棋,我当即许诺,以后每年回去陪他下棋,没想到竟无法兑现了。从那以后,无时不在想念他,然而,却不曾写过任何有关他的文字,直接的原因是有关先生的文字并不好写。先生的文章素来诗

哲并重,情理兼达,学风精思凝重,文风却行云流水,这既表明他的才高,又表明他的实行,因为情的表达总是作者身心的倾注。可是,情最伤人。这也是我不愿触及的私心。但根友兄嘱我为先生写点纪念的文字,自知这是难辞之责。

我想,先生是大家,学通古今中西,在中国哲学领域,他也贯通儒、道、佛、易,从学弟子中,依各自所好皆有所开通,于是会形成如此的格局,从事于儒者说先生是儒家,从事于道者说先生是道家,从事于佛者说先生是佛家,从事于易者可说先生是易家,又可有人说先生是启蒙家,这可以说是先生学术的复杂与泛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先生是一个道家。这么说不是要为道家抢山头,而是为要确切地道出他的学术价值倾向与心意所往。记得许多年前,与学长齐勇兄谈起先生的时候,他说道:萧先生在思想倾向上是道家,在为人上他是一个儒家。我想这么说大概是实情,这或许是他的生活经历与个性修养造就了如此的格局。说他是儒家,不仅因为他为人的信义、德性的修养以及伦理规范的讲求,更因为他对中国人现实处境的倾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心,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而要说他是道家,则又是由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对于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反思,对现实生活中人生百态的洞察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过,这是一个主动选择与实现的结果。这如同说,立于儒家的土壤,却生出了道家的果实。

萧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反省,应当是延续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他推崇那个时期从传统儒学中来,却充满了历史理性、批判与反叛精神的思想家,诸如李贽、何心隐、戴震、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傅山、唐甄、颜元等,认为他们主张“相反之论”,反对“以水济水”的思想,是特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自我批判,是旧思想即将崩溃、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是一种启蒙的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启蒙运动虽然曲折坎坷,没有完成,但毕竟出现过。故此,应当继续完成这样的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完成“补课”任务。我们知道,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批判与反省才实现的,没有沿着一条永不改易的路线走下去。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其近代化与现代化,正是在于出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大革命,以及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界,则有理性主义及其非理想主义的迭起。至今在西方思想界看来,一个社会丧失了自我批判能力是非常危险的,如同人类丧失了反思的自我意识。中国社会之所以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止步不前,如同做着类似简单重复的游戏一样,从哪里出发,还回到哪里,永在原地打转,就在于缺乏像西方社会所发生的那种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儒家的思想,尤其是道学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不反思的。

对待儒家,萧先生的确是多有批判,但是,他并非不加分别地批判。在《传统·儒家·伦理异化》这篇重要论文中,他根据《韩非子·显学》所指出的“儒分为八”的史实,质疑后来的儒家所宗奉的传统到底是哪个“统”?就董仲舒所宗奉的那个“统”来说,是把儒家的宗法伦理意识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举贤良对策》),并由此织成了“三纲”的大网,网罗百代。而程朱、陆王等理学家所宗奉的那个“道统”与“天理”,无非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传统,加以自家“体贴”,从本体论与功夫论上落实了董仲舒的“道”与“统”。然而,“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的,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抹杀人文意识的伦理主义。它不仅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尤其抹杀了人的个体性,把个体消解于异化了的群体人伦关系之中。”正是根据这个总体的认识,萧先生强烈主张,只有冲破伦理主义的网罗,才可能唤起人文主义的觉醒。与此相关,他认为,将儒家文化作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把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和儒家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道家文化精神,萧先生可以说是心向往之。他为何向往道家文化精神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赞赏道家学者的那种社会批判意识。他对道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他晚年写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诸如《道家·隐者·思想异端》《道家风骨略论》《道家学风述要》等,认为道家“植根于没落贵族下降而形成的逸民或隐士集团,以失势退隐的在野派自居”。也就是说,道家的社会基础在于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份却是布衣的群体,他们被褐怀玉,“学而优却不仕”,这些“避世之士”往往是一些奇才。他们总是处于被罢黜、受排斥的境地,然而,这些遭遇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信念,反而遭遇使其更显“风骨”,他们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保持独立不阿的批判态度,“固执天道自然,抗议伦理异化”,故而一直被

视为思想异端。道家对社会、自然的观察采取了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研究态度,因而它比儒家把“道”局限于伦理纲常的论文至上、及其道统心传,更具有理性价值,更接近于科学的智慧。道家虽然对社会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却从不褊狭,也从不视他者为“异端”,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开放包容精神,像老子所崇尚的“知常容,容乃公”,庄子所坚持的“物论可齐”,司马谈所推崇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皆为道家学风的典型性表达。如果一个社会异口同声,万马齐喑,听不到一点异样的声音,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缺乏批判力,也就是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正是萧先生在晚年大声呼唤道家精神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主张“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的具体体现。

在学术界有一种现象,一个学者从事于某个研究领域,这学者也就逐渐变成了这个领域的学者了。不过,这只是所从事的研究对象给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如同做了某个方面的研究,就吃这碗饭了。要想成为研究对象那样的人,拥有那样的人格,需要两个条件,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也有生活经验上的相通。萧先生向往道家风骨,人所共知,然而,萧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道家学者,则要归因于个性化的经历,尤其是晚年的生活经历。记得在跟他做学生的时候,许多其他专业的同窗经常说起先生,说他有一身傲骨,我们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然而,要做有傲骨的人,就要为有傲骨付出代价。没有经过考验的傲骨,只是外在气象上的;只有经过了考验,而且挺立住了,那才是透骨的超越人格。先生一生经历过许多自不用说,没想到的是,到了晚年还经历了人生的大考验,无意当中被漩进运动洪流当中,“小路寂寞觅多时,尘埃散尽报春迟”。在那个需要耐心和等待的岁月里,先生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不计个人得失,只关注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始终拥有丹柯一般火样的心和澎湃的热情,翘首以望未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先生有一篇文章,专谈船山的人格美,我想那是他借船山故事勉励自己和学生,所谓“师生同好”吧。此前不久,我又一次与齐勇学长谈起先生的时候,我说道:先生晚年的那些遭遇,正好成全了他的人格。这话得到了齐勇学长的认同。跟随先生学习,自然是受益很多,但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那个格、那个范,还是最大的。

最后那次去看先生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他拿自己的经历,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好像刚刚开始,却马上就要画句号了。能做的事情赶紧做!”这成了先生对我说过的最后的话,这时常在耳边响起的声音,也成了永久的记忆。

浅谈萧蓬父先生的子学^①思想

吴根友

记得萧先生晚年多种场合都拒绝别人以“国学大师”的称号来称他。这其中的原由还有待仔细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萧先生对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皆有自己的独特心得。现已经出版的三卷本《吹沙集》可以为证。仅就经学的研究而言,萧先生对《周易》与易学可谓是别有会心,他提出的“人文易”观念,以及“人文易与民族魂”的关系问题,可谓是当代易学研究中非常值得深入开掘的思想观念与学术问题。而在史学方面,他虽然未对任何一部具体的史学著作发表研究论文,但他所写的《古史

^①“子学”,此处并不局限于“先秦诸子”,而是指包括先秦诸子在内,在汉以后“经学”之外的百家思想。刘勰“博明万事为子”的“子学”定义,大体上可以作为本文所讲的“子学”概念的内涵。而从外延来讲,“子学”是包含了先秦诸子与汉代以后经学、史学、集部以外的“子部”之学术,大体上可以《四库全书》中的“子部”典籍为其外延。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梳理中国学术史的话,经与经学要给予恰当的分梳。“六经”(实际上是“五经”)是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然而关于“六经”研究所形成的“经学”,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子学”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多是“依经立义”的。至于汉代以后,儒家的少数子部著作被升格为“经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但“子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恰当加以研究的部类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在今天,有人提出“新子学”(方勇)的概念。我想,这也可以促进我们认真研究“子学”以及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对萧蓬父先生的子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也可以看作是对子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